

漳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丛书

漳州拨乱反正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漳州市档案局（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漳 州 市 援 乱 反 正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漳州市档案局(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年2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漳州拨乱反正/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漳州市档案局编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7

(漳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丛书)

ISBN 7-80145-020-5

I. 漳… II. ①中… ②漳… III. 中国共产党—福建—漳州—史料 IV. D235.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436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 千字

1998 年 7 月 第 1 版 199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020-5

定价:18.00 元

《漳州市拨乱反正》

编审：巩玉闽 梁少云

主编：杨启新

课题组成员：

杨启新	沈快生	林文山	罗玉初
曲世姜	李湘君	徐养明	沈克强
方志南	陈金资	林冠福	林松辉
吴立毅	刘 强		

目 录

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1)
拨开乌云见晴天 迈出大步奔四化	
·····	中共芗城区委党史研究室(42)
政策暖人心 万众颂党恩 ·····	中共龙海市委党史研究室(61)
解放思想,落实政策,开创新局面	
·····	中共漳浦县委党史研究室(80)
摆脱“左”的束缚 探索振兴之路	
·····	中共云霄县委党史研究室(94)
扫除迷雾 开拓前进·····	中共东山县委党史研究室(119)
落实党的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	中共诏安县委党史研究室(135)
解放思想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中共平和县委党史研究室(148)
驱迷雾端正航向 鼓风帆破浪前进	
·····	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162)
夯实改革开放的根基·····	中共华安县委党史研究室(184)
澄是非 团结一致干四化·····	中共长泰县委党史研究室(206)
向科学进军·····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219)
春天的硕果·····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244)
漳州拨乱反正大事记·····	(268)
后记·····	(290)

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

——漳州市拨乱反正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本文将主要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三方面，叙述 1977 年～1982 年这 6 年间，龙溪地区（即今漳州市，1985 年龙溪地区改称漳州市）在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并由此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概况。

一、1977 年的揭批和清查

1975 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面整顿成绩显著。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11.9%，创造了 10 年“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整顿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他们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之后，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又一次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搞乱阶级阵线，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龙溪地区也遭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 1976 年的漳州市（即今芗城区。1985 年龙溪地区改称漳州市时，原漳州市改称芗城区）为例：

首先，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猖獗，党的领导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诬蔑整顿期间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有严重政治、经济问题的人是“只反贪官，不反皇

帝”，是“矛头向下”、“整群众”，甚至还把某些人当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他们还诬蔑整顿期间派出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是“邓记工作队”、“三项指示为纲工作队”。诬蔑整顿“软、散、懒”班子是“整顿为纲”，把在路线教育中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诬蔑为“还乡团”、“复辟狂”，而把被整顿掉的干部统统称之为“受迫害”。此外，这一时期社会上又大刮揪斗风。据不完全统计，漳州市（今芗城区）1976年被揪斗、围攻的干部（包括工作队队员）有104人。有29个单位瘫痪或半瘫痪。在揪斗干部风盛行时，有许多同志家被抄、人被打、东西被抢走。^①

其次，刑事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打、砸、抢盛行。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社会治安秩序一度极为混乱。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漳州市（今芗城区）1976年1月～10月，发生凶杀案件5起，比1975年同期增加66%；较大的打砸抢案件18起，比1975年同期增加17倍。在这18起打砸抢案件中，共伤亡56人（其中死亡2人，重伤11人）。城区还发生用硫酸、硝酸、盐酸进行打砸抢的案件多起。^②

再次，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1月～10月漳州市（今芗城区）全市工业产值比1975年同期下降11.2%。据全市114个国营和集体工厂企业统计，产值比1975年同期下降的有58个单位。麻纺厂停工停产半年，到1976年10月底恢复生产时，128台大小布机全部不能正常运转。仅这个厂1976年头10个月的产值就比1975年同期下降45.3%，只完成当年计划的39.06%。

农业生产上，粮、油、茶、果都没有完成计划。林、牧、副、渔的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1976年10月底，漳州市（今芗城区）生猪存栏数只完成规划指标的47.6%，1月～10月上市量只完成规划的24.3%。生产队的集体养猪基本垮台。淡水养殖1976年全年计划8000担，可1月～10月只生产1100担。农田基本建设几乎停顿下来，农田基本

建设专业队几乎全部散掉。农业机械 1976 年只增置拖拉机 5 台，比 1975 年同期减少 10 倍。

财贸方面，损失也很严重。漳州市（今芗城区）1976 年头 10 个月的财政收入比 1975 年同期下降 12.9%，支出比 1975 年同期增加 8.36%，少收多支合计 354 万元。1976 年 1 月～10 月生猪收购比 1975 年同期下降 33.86%。1976 年夏粮征购任务只完成 81%，比 1975 年同期减少 22.9%。^⑧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1977 年龙溪地区发动了揭批查“四人帮”的三大战役。即：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第一战役；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的第二战役；揭批“四人帮”在各方面流毒和影响的第三战役。

在揭批斗争中，龙溪地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指示，学习党中央对揭批斗争的部署，不断解除部分干部群众怕运动反复，怕帮派势力，怕得罪人的思想顾虑；解决少数领导干部自己有错误，背包袱，领导不力，甚至“捂盖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际，充分揭露“四人帮”对龙溪地区的干扰和破坏。特别通过开展 1975 年与 1976 年“两个年头，两种结果”的回忆对比，认识揭批斗争的严重性、必要性和尖锐性。广大干部群众说，对“四人帮”不揭不批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运动不搞彻底更不行，表示一定要积极主动地投入揭批查战斗。

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龙溪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分清了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的是非，开始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对 1975 年工作的评价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1975 年，漳州人民在邓小平主持全国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领导下，学理论、批派性，有力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狠抓计划生育，掀起规模空前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全地区全年

完成土石方 7000 多万立方,平整土地和改造低产田 39 万多亩,全地区当年粮食增产 2 亿斤。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战线也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四人帮”却诬蔑 1975 年是“全面翻案复辟的一年”,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广大干部群众说,“四人帮”对 1975 年工作的诬蔑,就是为了把人民的思想搞乱,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

关于反对派性和调整领导班子问题。1975 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党中央下发的(1975)21 号文件要求:“对于那些抱住资产阶级派性不放、屡教不改的人,必须尽快调整”,同时指出,“有相当一部分县委领导班子还存在着‘软、散、懒’的情况”。1975 年龙溪地区在批派性中,对“软、散、懒”班子进行整顿,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广大干部群众说,“四人帮”污蔑反派性和调整班子是“打击造反派”,是“拼凑还乡团”,他们的用心是极为险恶的。

在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地区 and 各县(市)都采取时间、人员、领导“三集中”的办法,先后举办 36 期、有 13000 多人次参加的机关干部学习班。同时召开扩干会,举办重点人、知情者学习班。采取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战斗小组短兵相接与个别政策攻心相结合;狠揭猛批重点人与做知情者工作相结合;内查与外调、部门与单位相结合的做法。上下协作,左右配合,步步深入,猛追到底,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打一场揭批查的人民战争。据当时统计,至 1977 年底,全地区共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共 2603 人,其中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925 人,当时被列为篡党夺权活动骨干分子的有 145 人。^④1978 年后,根据中央关于“两案”审理工作指示精神和有关政策,对上述被清查人员逐步进行了区别、处理。被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和一般政治错误共 108 人。其中已被判刑劳改的少数人,也鉴于他们的错误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行为,于 1981 年~1982 年分别得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予以释放和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或党内处分等处理。其余绝大多数同志均属于说错话、办错事,一律予以解脱。

在思想政治路线初步拨乱反正的同时,龙溪地区 1977 年继续不断整顿、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据不完全统计,1977 年全区共提拔地委部委办领导 7 人,提拔地区局领导 42 人,提拔县委常委 50 人,提拔社(场)领导 32 人。通过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更加朝气蓬勃,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区 10 个县(市),好的和比较好的班子由 4 个增加到 6 个,原来 3 个较差的县(市),也从根本上获得改变。据 8 个县(市)、88 个社(场)班子调查,好的和比较好的由 26 个增加到 47 个,一般的由 37 个减为 31 个,较差的由 25 个减为 10 个。绝大多数班子领导成员革命精神焕发,成为积极带领群众的“火车头”。^⑤

二、改变历史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 年 5 月中旬,《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要不要重新确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两个凡是”的理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它既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也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此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制定,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978 年,当中共龙海县委提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还有一部分人不敢抓,不敢搞。有的怕被说成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有的怕“烧香惹鬼叫”,闹出乱子来;连干部家属也心有余悸。还有的干部怕拨乱反正反到自己头上,主张“慢慢来”、“等一等”。

面对这种情况,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坚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联系龙海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伪造、歪曲、篡改、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好地澄清了被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县委一致认为,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了的就要大胆承认，勇于揭露，把那些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⑥

县委认识提高后，立即于1978年6月底，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代表县委作报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对龙海县干扰破坏的种种表现，冲破了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同时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具体步骤。广大干部群众听了报告后，无不欢欣鼓舞，感到县委讲出了多年来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

县委认为林彪、“四人帮”对龙海县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突出表现在“三砍一取消一加重”上即：

一砍经济作物。1970年大搞所谓“挖修粮”，不少地方组织“锄头队”，强行“砍三宝”（生姜、番茄、生地）、“锄五苗”（果蔗、蔬菜、辣椒、烟叶、地瓜）。全县共砍掉水果15000多亩。九湖公社长福大队的“百花村”，是外贸出口的花果苗基地，也被加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罪名，砍掉各种花果苗93.3万株，价值达61.15万元。

二砍社队企业。砖瓦生产是龙海县一项收入较大的传统副业，产品不仅满足本县需要，还远销东南亚，却被指责成“以钱为纲”，全县先后被砍掉集体瓦窑216座，占当时瓦窑总数的62.4%。仅榜山公社北溪头大队就被强行拆毁瓦窑18座。全县还砍掉其他社队企业156个。

三砍正当的家庭副业。1970年，全县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行没收社员自留地、自留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1380个生产队（占总数一半以上）将自留地收归集体，有1159个生产队收自留果8.14万多株。不少社队还规定“鸡头鸭头，不准超过人头”等土政策，限制正当家庭副业的发展，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浮宫公社当时还搞所谓“十三收”，连社员个人缝纫机、自行车等也要收归集体。

“一取消”，就是取消经营管理制度。劳动管理上取消“评工记分”，财务管理上，机构被取消，人员被解散，许多社、队出现了经济无

核算、帐目无人管、分配不兑现等严重问题。1974 年全县社员超支欠款达到 968 万元，社员平均收入由过去的 81 元跌到 64 元，社员平均口粮由 504 斤降到 336 斤。港尾公社汤头大队，原全省经管工作的一面红旗，却被当作“管、卡、压”的典型来批判。使得这个大队制度废弛，财务混乱，有些干部不劳动，每人每年还照记四五千个工分，全大队脱产干部 33 人，平均每 15 户负担 1 人。有 5 个生产队长期不记帐，有的生产队一年换了 8 个出纳轮流管钱。结果漏洞百出，贪污盗窃严重，先进队变成“负债队”，全大队共负债 29000 多元，8 年欠购粮食 185 万斤，社员超支欠款达 58000 多元。

“一加重”，就是加重农民的不合理负担。非生产人员，非生产性建设，非生产性开支的“三多”问题相当突出。全县共有非生产人员 4975 人，占劳力总数的 2.27%，平均每个农业大队达 18 人。据不完全统计，那几年全县大队一级盖会场、办公室，共用款 140 万元，用粮 24 万余斤，用工 83 万个工日，一些企事业单位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国家供应的化肥、机械、“三材”等物资，社队有了供应指标要买货还得讲人情，开后门。

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县委抽调 83 名干部加强落实政策工作。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龙海县是极“左”路线的重点区。1969 年全省“清队”现场会在该县召开，会后全县上下刮起“揪斗风”、“逼、供、信”，全县县、社机关干部被作为敌我矛盾进行审查的有 113 人，连一批老劳模、老标兵、老农业专家也难以幸免。许多同志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活活打死，全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 199 人。^⑨县委要求重新清理对这些受迫害同志的档案，把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一切捏造的材料全部销毁。并召开万人大会，为被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老劳模及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原步文公社党委副书记陈玉井同志，是个敢抓敢管、埋头苦干的好干部，在“清队”中被迫害致死，县委给予彻底昭雪平反后，公社党

委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对他过去的工作加以肯定和宣扬。这个公社的干部反映说：“这几年我们一想起陈玉井同志就心寒，现在党为他昭雪平反，伸张了正义，使我们增强了革命的斗志。”

县委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识别林彪、“四人帮”以所谓“以粮为纲”、“突出政治”、“备战夺粮”等为幌子，破坏全面发展，搞乱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搞垮集体、搞穷社员的假马克思主义。

北溪头大队原来每人只有3分6厘耕地，他们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基础上，经营砖瓦生产。全大队22座瓦窑，年产值50余万元，对发展集体经济和解决劳力出路起了很大作用。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却把这个大队当作“以钱为纲”的黑样板而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批判。此后，集体收入下降，粮食生产减少，社员年收入由116元下降为54元，口粮也大幅度地下降。通过讨论，群众说：“林彪、‘四人帮’砍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他们这一砍，把集体经济搞垮了，把社员生活搞苦了。”

港尾公社大径大队社员王能美，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年年超额完成集体的投工投肥任务，还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从1960年到1970年，10年间共卖给国家大猪38头，猪苗124头，鸡、鸭、兔数百只。王能美因此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福建日报》宣扬过他的模范事迹。但这样一个好社员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却被打成“副业单干的黑标兵”，遭到万人大会批判。为了拨乱反正，县委抓住这个典型，也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县委说：“王能美热爱集体、热爱国家、热爱劳动，天下哪有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家庭副业不但没有错，而且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

通过结合实际开展讨论，广大干部群众初步分清了是非，党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当年春夏两季，全县在战胜长期低温阴雨之后，取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3.1亿斤，比上年同期增产0.58万斤，增长两成半，超额完成龙溪地委下达

的全年增产指标。“五夏”工作搞得既快又好，在完成 36 万亩晚稻种植计划的同时，还开山扩种地瓜、杂粮 1.8 万亩。8 月上旬，全县就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并有 2 个公社、82 个大队一季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

（二）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但是，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上，龙溪地区有不少单位，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满足于读读文章，并没有认真开展讨论。^⑥全国各地此类现象亦不少。

1979 年 9 月 12 日～23 日，福建省委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贯彻中宣部“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在全党进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指示。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韩树英到漳州，专门对地直机关干部作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告，对推进全区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起了促进作用。

1979 年国庆节后，全区各地即通过召开地委、县委工作会议、理论讨论会、理论工作会议、报告会、学习班等多种形式，广泛组织干部群众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出发，联系实际，认真总结，提高认识，转变思想。

南靖县的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弄清楚就分不清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工作上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不解放，重点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该县财贸系统的同志联系农贸市场数度变化情况说：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南靖在市管工作上搞了过“左”的扩大化，把社会主义的大集市当作资本主义泛滥来批判。对农贸市场采取“一关二改三赶”的政策（关：关闭农贸市场，全县有 13 个小圩场被逼关闭；改：乱改圩期，将原来 10 天 3 圩改为 10 天 1 圩；赶：不准农民集市，驱赶集市的社员）。结果农村社员的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城镇居

民又买不到东西。

南靖县委组织部门的干部回顾落实党的右派摘帽、改正和安置政策的过程,起先由于思想不解放,工作上采取“一等二看三拖”的态度,影响工作进度。后来通过学习文件,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提高了思想认识,实事求是地落实好这项政策,调动了这部分同志的积极性。同时还为 142 名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平反恢复名誉。干部群众反映说:“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收获。”

云霄县于 10 月 20 日~25 日召开全县理论讨论会。会议期间,听取了县委作《深入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的报告,认真学习叶剑英副主席在国庆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自始至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方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补课中,云霄县委强调要联系三个问题:1. 要联系思想实际,引导干部、群众分清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进一步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根本观点。2. 要联系工作实际,联系解放 30 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要联系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执行的情况,凡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要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确实加以解决。通过学习讨论,要把工农业和其他事业尽快地搞上去。3. 要联系整顿党风。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要造成党内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任的好风气。^⑥

1979 年 11 月 15 日,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龙溪地直机关党委联合发出《关于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通知》要求,通过学习和讨论,“不仅要弄通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并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时，龙溪地委和各县（市）委都特别强调：补课能否补到实处，关键在于领导。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担负着带领广大群众搞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他们的思想路线对头与否，思想解放与否，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关系很大。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这次补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真正起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要带头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而且要带头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带头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要切实做到见成效于思想、工作的改进。

这次补课有一个显著的进步是，地委和各县（市）委普遍结合学习叶剑英副主席在国庆 30 周年的重要讲话，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基层。

龙海县角美公社石美大队是龙溪地委抓的一个试点。10 月下旬，地委工作队进村。先培训骨干，组织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宣传员先学。然后各生产队以农民夜校为阵地，骨干带头，开展群众性学习讨论。通过学习，他们体会到：

1. 由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干部、群众的团结增强了。在学习讨论中，许多干部、社员反映，过去大家被“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斗苦了。运动接连不断，事事“上纲上线”，天天查斗争动向，项项大批判开路，结果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搞得人人自危，担心“犁不着，耙也着，耙不着拉耙也会打到”。不仅把人们的思想斗乱了，组织斗散了，经济斗垮了，而且使党群、干群之间，垒起一堵墙，关系紧张。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干部既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罪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消除了怨气，增强了团结。

2.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民主空气浓厚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现代迷信，搞思想罪。谁讲错一句话、喊错一个口号，或对上级指示、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就要遭受斗、批、抓。有一年强令推广种“稻底薯”，有的生产队干部思想不通，就被叫到学习班训，并被

警告说：“就是没有收成，也要种，这是路线问题”。这次学习，大家反映叶帅强调解放思想，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有“三不政策”，现在可以敞开思想了。讨论中，大家对“文革”的评价，对上级的一些错误决定，对干部的作风问题，都敢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评建议，民主空气浓厚了。

3. 提高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推动各项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在学习讨论中，干部、社员联系粉碎“四人帮”两年里，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生产搞上去的变化，深刻体会到生产要再发展上去，就必须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各项政策。大家对照《决定》精神，认为在劳动管理上虽然克服了过去记“大概工”，搞政治评分的错误做法，但当时多数队仍采取死分死评的办法，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应根据农活季节、生产质量和完成数量，实行定额管理责任制。在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问题上，过去限制社员养鸡养鸭，后来禁令虽然取消了，但规定只能在家里圈养，不许往外放牧。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为这个规定限制过严，应当改为在不损害集体庄稼的前提下，允许社员放牧。关于社员自留果树问题，以前大队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房前屋后的果树全部收归集体，当时有的队还没退还。结果后来发动种果树，社员宁愿种白桉等短年生的树，不愿栽果树，原因是群众怕政策多变。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为关键是政策未落实。因此，大队决定退还果树，并重申今后谁种谁摘，永远归属个人，终于打消了群众的疑虑。^⑨

总之，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划清真高举与假高举的界限；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三）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